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农业经济技术研究所

通 讯

第 5 期（总第 389 期）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2022 年 5 月 5 日

-
- ◆ 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郭书田(1)
 - ◆ “中国扶贫”的政治经济学.....罗伯特·沃克 杨力超(4)
 - ◆ 加快发展乡村产业厘清几个问题.....孙志刚(8)
 - ◆ 夯实农业生产基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柯炳生(11)
 - ◆ 乡村振兴须谨防五大误区和谨记六大要点.....陈 杰(14)
 - ◆ 实施乡村建设行动的战略任务与实现路径.....秦国伟(17)
 - ◆ 当五条人遇见大南坡：镜头会记录下的诚实.....凌 敏(20)
 - ◆ 推进农业标准化，更好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陈晓华(24)
 - ◆ 《农业与工业化》：中国人的经济理论创新.....张蓝水(26)
 - ◆ 在开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解决好“三农”问题.....叶兴庆(30)

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

郭书田

地球人类发展历史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在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的过程中，也是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同时也是由帝王制向共和制转变的过程。这个过程是漫长的，有几个共同的特点：一是在资本主义工业化快速发展中，仍然保留着大量的家庭手工工业；二是转变不是一帆风顺的，往往出现多次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因为被推翻的统治者不甘心退出历史的舞台；三是由帝王制向共和制转变过程中会有一些过渡性态的制度安排，如君主立宪制，有的还保留至今；四是社会制度的转型不是一刀切截然分割的，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交叉发展的；五是在社会制度变迁与政权交替时，多为武装形式，也有和平形式，还有二者交叉形式。

在资本主义发展起来之后，出现了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走上了军国主义的道路，采取军事与经济等多种手段，向落后国家扩张侵略，建立殖民地，使之成为他们的附属国。这被列宁称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为了瓜分殖民地的资源，产生了帝国主义之间的激烈斗争，两次世界大战就是这种斗争的突出表现，而殖民地的人民长期处于苦难之中，这种斗争直到如今仍然存在。

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使人类社会进入由共产主义替代资本主义的新阶段，开创了人类社会历史的新纪元。今年是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共产党宣言》问世 170 周年，全球都在举行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我国于 5 月 4 日举行了隆重的纪念大会，习近平总书记作了长篇演讲，反响甚好。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不是偶然的，具有深刻的历史与社会根源。他以极大的精力，研究与批判地吸收了德国黑格尔与费尔巴哈的古典哲学，英国亚当·斯密与李嘉图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圣西门、傅立叶与英国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形成马克思主义三大组成部分。他是集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大成而具有超越前人划时代意义的伟大思想家，他是创立共产主义理论与领导第一国际实践的伟大革命家。自 1848 年《共产党宣言》诞生以来，学习与宣传马克思主义有几次高潮。第一次就是《共产党宣言》，用多种文字在全球发行，数量超过了《圣经》。1920 年 8 月，第一个译本在上海出版问世，译者为陈望道，组织翻译出版的是中共主要创始人陈独秀。第二次是 1894 年《资本论》第三卷出版发行（第一卷为 1876 年，第二卷为 1893 年，历时 27 年），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出现经济危机时，人们渴望从中寻求解决危机的答案。第三次是在 1917 年列宁领导俄国的“十月革命”，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俄国

又是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引起人们研究共产主义理论变为现实的经验。第四次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一方面出现了一批摆脱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纷纷独立成为新兴的民族主义国家；另一方面东欧各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以及中国等亚洲一些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形成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马克思主义成为这些国家执政的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在莫斯科建立的情报中心实际是第三共产国际。马克思主义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也出现过几次低潮，受到干扰。最大的一次是 1991 年苏联解体与东欧剧变，引起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质疑，也使各国共产党人反思。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不动摇，纠正在实践中出现过的失误，实行改革开放的方针，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不景气形成鲜明的对比，重新引起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热议。

的确，由 16 个加盟共和国组成的苏联，在十月革命胜利 74 周年之后解体，纷纷独立，苏共失去了执政地位，“卫星上天，红旗落地”。接着东欧剧变，南斯拉夫联盟 6 个加盟共和国也纷纷独立，共产党变成在野党或消失。应该承认，这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次重大挫折，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创伤。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就有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模式，有以第二国际为代表的社会民主党在欧洲一些国家的社会主义，有俄国十月革命列宁的社会主义与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有南斯拉夫铁托的社会主义，有中国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有朝鲜金日成的社会主义，有印度支那胡志明的社会主义，在拉丁美洲有古巴卡斯特罗的社会主义等，都不同程度地仿效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以它为榜样，也可以说是这种模式的翻版，遇到的困难也大体是相似的。这就出现了一个不能回避的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实践关系的问题，需要认真反思。一些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失败，不是社会主义的失败，更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失败，其失败的根源是对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僵化的教条主义和异化的实用主义。俄罗斯一位著名学者称，对马克思主义采取强制与灌输的方法是很错误的，提醒中国也要注意这个问题。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三条标志：一是公有制，二是计划经济，三是按劳分配。从实践看，公有制实际是吃大锅饭缺乏活力的官僚所有制；计划经济实际是否定市场经济价值规律，由政府包揽一切的政府行政经济；按劳分配实际是挫伤积极性的平均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实行的结果是“短缺经济”，人民贫穷。加上在政治上阶级斗争与党内路线斗争扩大化，以及学术问题政治化，将无产阶级专政蜕变为个人专政，使一大批党的领导人与知识分子遭受了种种迫害，窒息了民主；在经济上消灭私有制扩大化，形成单一的所有制，滞塞了活力。这种模式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与资本主义国家差距越来越大，引起人民群众的不满，这是解体的内部因素，也是主要因素，同时也不排除外部敌对势力的介入因素。其实早在 1956 年的波兰与匈牙利事件，就是说爆发这种模式弊端的政治信号，还产生了对形势的误判。这样的反思，并不是否定斯大林在反法西斯二次世界大战与战后建设中取得的成就。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大会上讲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学习与践行马克思主义九条要求是正确的，需要落实。

第一，马克思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产生出的一位人类伟大思想家。马克思是人，而不是神，不能把马克思当成神仙，从而产生愚昧的迷信，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科学当成宗教。

第二，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马克思与恩格斯一起，不断修正在实践中证明不合实际的观点与主张，不能把在实践中对马克思的某些观点有所突破斥之为“修正主义”或“机会主义”，例如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

第三，在后资本主义时代，有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吸取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观点，扭转了经济危机，也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引进资本主义先进技术与管理体制，提高效率，出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格局，因此不能再以“姓社”与“姓资”作为检验政治立场的标准与依据。

第四，真理是相对的，绝对真理往往寓于相对真理之中，也就是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因此要重视真理的相对性与特殊性，丰富与发展真理的普遍性。对待马克思主义也应持这种态度。

第五，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离我们太远，《资本论》也很难懂，因此淡化或远离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就在自己身边，无处不在。因此，就要认真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联系自己的实际，能够坚定方向，明辨是非，化解困惑，也就能贴近马克思主义。

第六，反思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干扰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是“左”的倾向，错误地认为“左”是革命的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左”比右好，把马克思主义当成僵化的教条，采取各取所需的实用主义态度，更为恶劣的是把马克思主义当成压制不同意见与整人的“棍子”。在学术问题上必须坚持“百家争鸣”方针，不能把学术问题政治化。

第七，马克思有关共产主义的理想，需要在实践中经验与发展。中国有影响世界的儒家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思想，道家的“天人合一”思想，与共产主义思想有相似之处，因此在学习与实践马克思主义理想中，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会产生有中国特色的共产主义模式。习近平总书记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应努力践行。

第八，马克思提出解放全人类的共产主义是长远的奋斗目标，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中国的基础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是马克思主义初级阶段的初级阶段，需要很长时间，要多少代共产党人的不懈奋斗，而不能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犯急性病。资本主义终究要被共产主义替代，是一个很长的历史发展过程。资本主义经历了民主资本主义，自由资本主义，人民资本主义，民粹资本主义，虽未能改变为大资产阶级服务的资本主义本质，也未能改变榨取工人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而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产阶级本性，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改善劳资关系，能够延长资本主义寿命，不是在短时期能够消灭的。超越历史发展阶段，超越生产力发展改变生产关系，超越经济基础改变上层建筑，是违背马克思主义本质的空想，必然遭到历史的惩罚，这个教训十分深刻，必须牢记不忘。

（作者：原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原司长，高级经济师。2018年5月5日）

“中国扶贫”的政治经济学

罗伯特·沃克 杨力超

中国的减贫成就举世瞩目。本文旨在系统梳理中国的减贫成就和经验，并探讨中国的政治制度如何助力扶贫事业取得伟大胜利。

1990年，中国约有66%的人口生活在日收入1.90美元的贫困线下，这一年，中国的人均GDP水平低于印度，但2020年中国的人均GDP比印度高出近5倍。中国的减贫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增长，国有企业改革、工业制成品的大规模出口以及世界最大规模的城乡人口流动等，也都有助于减贫工作的开展。

除了推动经济发展，中国还努力协调国家层面与省、市以及乡村一级的扶贫战略。在国家层面，除了关注经济增长，还积极兴建基础设施，在欠发达地区大力修建公路、高速铁路、机场。各省份则发挥本地优势，促进电子商务、自主创业和社会援助的发展。中国政府鼓励成功企业和发达城市支持初创企业和贫困地区发展。基层公职人员除了日常工作以外，还挑起了精准扶贫的重任。脱贫攻坚战得到中央政府强有力的协调和支持，也同时得到了各级干部的拥护，一些干部从中央直接被派驻到地方去领导当地的减贫工作。

有人可能会说，中国取得减贫成功，是因为中国共产党能在社会中协调好各种因素，实现不同层级的治理。多年来，中国政府肯定有治理和政策上的延续性，但是随着领导人的更替，以及宏观经济和社会环境的不断发展，情况也会随之发生相应的调整。

扶贫的政治渊源

贫困问题本质上是政治问题。中国几千年来对统治者的政绩评价都与贫困治理息息相关。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饥荒和贫困首先被视为是统治者的责任，孟子就提出“故居者有积仓，行者有裹囊也”。事实上，在一个仁政的社会中，即便是“君权神授”，也是有条件的，贫困的存在等同于统治者的失职和无能。

2021年2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他指出，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同贫困作斗争的历史。屈原曾感慨“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习近平总书记通过脱贫攻坚的成功论证了中国政治制度的优越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曾多次划定贫困线。1978年至2008年的贫困线测算，是基于每天获得2100卡路里所需要的成本再加上15元用于非食品消费，从最初的每人每年100元的生活成本逐年递增。2008年划定的贫困线将非食品消费提高到40%，并将低收入线提高了38%。人均每年收入865元，最早是2000

年的低收入线，后来被划定为贫困线。2011年，中国开始采用年收入2300元的贫困线标准，进一步将非食品类别的消费提高到53.5%，但仍以每天提供2100卡路里同时包括60克蛋白质为基本目标。新贫困线的引入将中国的低收入线提高了80%。

以这几条贫困线测量得出的数据表明，自1978年以来，中国的贫困发生率和贫困人口都有大幅下降。1978年，依据当时的贫困线测算，中国农村贫困发生率在37%，到2008年该贫困线停用时，农村贫困发生率下降到只有1.7%。如果用现行贫困线测量，1978年，中国有97.5%的农村人口为贫困人口，而到2019年，贫困发生率下降到仅为0.6%。用世界银行的贫困标准测算，中国的贫困发生率从1980年的89%（可以获得数据的首年）下降到2019年的0.5%。

中国将减贫作为首要任务，也是一项神圣的使命。习近平总书记曾公开说，“扶贫始终是我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我花的精力最多”。他对扶贫工作的投入在其个人履历中一以贯之，包括他在陕西省梁家河村的成长经历，以及20世纪80年代在福建省宁德地区的工作经历。他在脱贫攻坚中取得的成就，也有利于推动其他方面的改革。

邓小平采用中国国学经典《诗经》中的“小康”来描述对中国发展成为一个中等富裕国家的愿景。1982年，中共十二大首次把“小康”作为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提出到20世纪末力争使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达到小康水平。2002年，中国共产党的会议文件中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2012年，在中共十八大上，习近平当选总书记。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把脱贫攻坚工作纳入总体布局和战略布局。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重申了消除绝对贫困的目标；2021年7月，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他同时提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解决绝对贫困问题：“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那么，为什么说脱贫攻坚战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最伟大的成就？

走上发展式扶贫

新中国成立之前，几十年的战争、饥荒让中国饿殍遍野，据统计约有1500万人死于饥荒。在一个农业人口约占88%的国家，土地分配不均，52%的农民只耕种了14.3%的可耕地。仁政和有能力让人民免于饥荒的治理都已经成为历史记忆，那个时期的中国民不聊生。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一些西方学者认为，毛泽东时代的成就是消除了大面积的极端贫困。然而，当时受到苏联“生产第一、生活第二”思维的影响，国家策略是推动经济增长。更具体地说，在当时错综复杂的国际政治环境中，新成立的中国政府一方面要保家卫国，另一方面要通过公有制快速实现工业化。解决贫困问题不是当时的燃眉之急。

1978年，新中国对农村贫困进行统计，农村贫困发生率为28%，但这时的统计单位并不是个人，平均年收入低于贫困线的县城居民都被统计为贫困人口，显然，非贫困人口被过度统计了。有研究表明，中国1978年的贫困发生率应为1950年的一半。

1981年，世界银行在国际比较的基础上得出了适度而积极的评价：尽管中国的平均消费水平增长缓慢，但在过去30年里，中国最引人注目的成就是让低收入群体在基本需求方面，比大多数其他贫穷

国家的低收入群体富裕得多。

1978年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发表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讲话，鼓励代表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之后，邓小平重申了四个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接着，邓小平又提出了“小康”的目标。他还在公开场合谈到贫困问题时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要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必须迅速发展和壮大经济。

农村改革使农村的贫困状况大为改善，但社会救助制度的完善还任重道远。1994年印发的《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对农村的扶贫工作作出了部署，提出要“消灭”而不是“减少”贫困，由此开创了一个直至2021年获得全面成功的伟大计划。

一些学者将1994年看作是中国由开发式扶贫到发展式扶贫的转折点。中国政府也在扶贫战略中纳入了一些新的举措。例如，要求每个中央国家机关对口支援一个贫困县，下级政府单位对口支援乡镇或村；引入与水、电、教育、公共卫生服务等相关的具体扶贫目标；强调把移民搬迁和增加非农业收入作为摆脱贫困的途径；将扶贫任务下放给省、自治区政府，东西部城市进行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让东部发达省份的城市帮扶西部省份的城市，东部省份的贫困县不再接受国家的扶贫资金，改由地方筹措资金。

1994年的改革大大增加了中央政府提供的扶贫资金，并引入了第三方监管。到1999年，中央政府发现，依据当时的贫困标准，有2000万人需要摆脱贫困，另外还有原先没有考虑到的、因身体残疾或受恶劣地理条件束缚而需要脱贫的2200万人。为此，政府提供额外资金，鼓励使用小额信用贷款，推动干部帮扶特定贫困户，持续提供更加精准的帮扶和援助。

以消除绝对贫困为目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格局长期保持平稳。这是中国消灭绝对贫困的重要基础。

2002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提出，要在21世纪的头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对此，新华社表示：在走向小康社会的道路上，占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首先必须帮助其人民摆脱贫困，实现丰衣足食。

200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除了继续推行扶贫政策，还更加突出了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的作用和影响力。2002年，中国政府提出了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为脱贫提供普遍的、个性化的制度保障。中国还取消了自公元前594年便开始实施的农业税政策，使中国农业更具有国际竞争力。

此后，《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提出：“到2020年，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

随后，一系列支持性措施出台。内容包括：全面实施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颁布一系列涉及农村残疾人扶贫开发的举措；进行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推动医疗、医保、医药改革；采取各项措施推进教育公平，保障农民工子女接受教育，减少留守儿童数量，吸引高水平教师服务乡村；等等。这些工作为构建有利于消除贫困的全面福利体系奠定了基础。

精准扶贫成效显著

习近平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即于2013年提出“精准扶贫”。

中国的贫困人口数据库囊括了所有生活在农村地区的贫困人口，统计数据成为评估工作人员绩效和衡量政策成功与否的手段。公职人员除了履行本职工作之外，还承担帮助指定家庭脱贫的职责。这项政策全面覆盖了全国各地的基层政府。另外，政府还下派党员干部深入扶贫一线，助力脱贫攻坚。

围绕精准扶贫方略，各项扶贫政策工具也已到位：推动宏观和微观层面的大规模的地方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农村地区产业发展；东部地区经济较强的市县支援西部贫困县发展；国有企业聚力开展“百县万村”扶贫行动；动员民营企业开展“万企帮万村”的精准扶贫行动。

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强调“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这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减贫运动具有多重作用，不仅推动了基层干部投入扶贫工作，也塑造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形象，提升了中共中央在中国民众中的政治威望。

作为全球政治的扶贫

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减贫成就更为显著，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国际政治息息相关。

在1995年举行的联合国社会发展世界问题首脑会议上，中国宣布了“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向国际社会表明中国的国家实力和人道主义关怀。2000年的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签署了《联合国千年宣言》，提出到2015年发展中国家实现8项千年发展目标。现在，中国已经成功地实现了所有8项千年发展目标。在2015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代替千年发展目标之前，中国的脱贫人口占到全球脱贫人口总数的一半。联合国于2012年开始制定“可持续发展目标”并于2015年向世界颁布。此后不久，习近平总书记重申中国将于2020年消除农村绝对贫困的减贫目标。

过去10年，人类社会经历了全球政治重组和愈加紧张的国际局势。在此背景下，减贫仍然是增强中国软实力和影响力的战略手段，这样中国便可以展示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以及倡导的新的全球治理观。

世界各地的中国使领馆举办活动庆祝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2021年中国发布《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白皮书，介绍人类减贫的中国探索和实践，分享中国的经验和做法。题为《中国减贫学》的智库报告介绍了一个“新领域”——“中国减贫学”。该报告指出：“中国减贫学是既有助于减贫、又有利于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分配理论。其核心要义是：锚定共同富裕目标、依托精准手段，构建政府、市场和社会协同发力的‘益贫市场’机制，解放贫困者的生产力，使他们不仅成为分配的受益者，也成为增长的贡献者，推动实现整个社会更加均衡、更加公平的发展。”

中国减贫的成功很难被复制。它是建立在40多年来持续的经济和政策发展的基础之上的，是建立在将贫困视为治理失败表现的几千年文化连续性的基础之上的，只能发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实现的协调管理和社会治理的环境中。中国的减贫道路或许是其他发展中国家无法企及的，但是很多经验是可以研究借鉴的。

（作者分别为英国皇家社会科学院院士、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社会学院教授；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社会学院副教授。译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贾亚娟）

加快发展乡村产业需厘清几个问题

孙志刚

习近平总书记在去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是‘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要求举全党全社会之力推动乡村振兴，并把加快发展乡村产业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首要任务进行部署。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我们要深刻领会和把握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用乡村振兴统揽新发展阶段“三农”工作，加快发展乡村产业，以产业振兴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努力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

产业兴旺是解决农村一切问题的前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产业兴旺，是解决农村一切问题的前提”。只有加快发展乡村产业，实现乡村产业振兴，才能更好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

产业兴旺有利于推动农村各项事业振兴。乡村产业发展壮大，才能更好吸引在外优秀人才、务工群众、大学毕业生回乡发展，推进乡村人才振兴。乡村产业能够持续带动农民增收、不断满足其物质生活需要，有利于进一步满足农民在文化、生态等方面的美好生活需要，更好推进乡村文化振兴、生态振兴。抓乡村产业发展客观上要求基层党组织强化自身建设、推进组织振兴，加强对群众的组织引导，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提高乡村治理水平，夯实党的执政根基。

产业兴旺有利于打通城乡经济循环堵点。城乡经济循环是国内大循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确保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关键因素。畅通城乡经济循环，最大堵点之一是城乡间要素流通不畅；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最大的潜力空间在农村。加快发展乡村产业，不仅有利于推动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更好畅通城乡经济循环，缩小城乡发展差距，而且有利于释放农村消费潜力，促进形成新发展格局。

产业兴旺有利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展乡村产业是实现脱贫致富的根本之策。在脱贫攻坚中，许多贫困地区因地制宜，通过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实现了脱贫摘帽。但总体看，脱贫地区产业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技术、资金、人才、市场等支撑还不强。从实践看，凡是富裕的乡村，大都有主导优势产业，广大农民能通过产业发展实现充分就业、不断提高收入。因此，只有乡村产业蓬勃发展，脱贫地区特色优势产业稳定发展、高质量发展，才能持续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有效防止返贫和新的贫困发生。

产业兴旺有利于增进广大农民福祉。乡村产业进一步发展起来，不仅能拓宽农民就业、增收渠道，让更多农民实现就地就近就业，而且有利于解决农民外出务工带来的留守儿童、留守老人问题，还能使农村“人气”越来越旺，加快乡村建设进程，让农民享受到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比如，在脱贫攻坚期间，一大批农民工返乡创业、参与乡村产业发展，既能获取收益，又能兼顾家庭，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

产业兴旺有利于夯实国家粮食安全基础。当前，我国粮食供求依然处于紧平衡状态，面对复杂严峻

的国际形势，粮食安全问题不能有任何闪失。要牢牢把握粮食安全主动权，在推动农村产业发展中合理布局种植结构，引导农业资源优先保障粮食生产，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延伸粮食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打造供应链，保证粮食产量和质量稳定，确保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因地制宜促进乡村产业加快发展

乡村产业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既要加强顶层设计，又要总结推广实践中行之有效的方法路径。近年来，一些地方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积极探索，狠抓乡村产业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积累了宝贵经验，乡村产业迸发出旺盛生机和活力。

精准选择产业。当前，我国乡村产业规模小、布局散、链条短等问题突出，品种、品质、品牌都有待提高。究其原因，主要是没有立足当地特色资源选准产业，没有顺应产业发展规律发展产业。要适应城乡居民消费需求变化、立足资源禀赋，精准选出最适合本地发展的产业，迅速扩大规模，推动乡村产业发展由粗放分散向集约化规模化转变。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因地制宜发展乡村旅游、休闲农业、文化体验、健康养老、电子商务等新产业新业态，推动乡村产业从单一种养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转变，更好发挥乡村农产品供给、生态屏障、文化传承等功能。

抓好教育培训。发展乡村产业的主体是农民。只有经过全面教育和培训，广大农民群众才能提升综合素质，让脑子灵起来、思想活起来、志气强起来、尽快富起来。要统筹用好各类培训资源，分类建立培训档案，农民需要什么就培训什么，农民怎么方便就怎么开展培训，把培训办到乡村农户、田间地头。坚持集中培训与现场实训相结合、线上培训与线下培训相结合、走出去与请进来相结合，提高培训效率，开展好从种到收、从生产决策到产品营销的全过程培训，培养更多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新型职业农民。

做好技术服务。振兴乡村经济，根本出路在科技。要针对乡村产业发展薄弱环节，加快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打好种业翻身仗，尽快解决一批“卡脖子”问题。统筹行业部门、科研院所、企业等技术力量，构建“产、学、研、用”联合协作机制，打通科技进村入户通道，把科学研究、实验研发和推广运用结合起来，实现问题就地攻关、技术就地集成、成果就地转化。加强科技兴农、智慧兴农，把技术服务与技能培训结合起来，围绕种、养、加、销关键环节，为群众提供育种育苗、田间管理、疫病防治等技术服务。

统筹资金筹措。贷款难是发展乡村产业最突出的堵点和痛点之一。要积极探索创新融资模式，综合运用财政资金、市场化基金、信贷、担保、保险等多种方式，加大对乡村产业发展的资金支持力度；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多渠道补充中小银行资本金，带动更多社会资本进入农业。同时也应注意到，产业发展是市场行为，财政不能大包大揽。

优化组织方式。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逐步把小农户引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是发展乡村产业一项紧迫而艰巨的任务。要因地制宜研究推广合适的组织方式，积极培育各类经营主体，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健全专业化社会化服务体系，把一家一户办不了、办起来不划算的事交给专业化社会化服务组织来办，提升生产组织化和管理现代化水平。近年来，一些地方结合自身实际，大力推广“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的组织方式，充分发挥龙头企业连接大市场的作用和合作社承上启下、组织动员力强的优势，有力保障了农民土地流转、务工及入股分红等收入，实现从农户“各自为战”向形成紧密相连的产业发展共同体转变。

深化产销对接。产销对接能够帮助农业生产者、采购者节本增效，解决小农户分散经营和农产品集中流通的矛盾，实现农产品生产供给与市场需求有效衔接。加快完善农产品产销对接体系，既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客观需要，也是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深化流通体制改革，加快现代流通体系建设，鼓励大型流通企业向农村延伸经营网络，积极培育和发展农村经纪人队伍，加快发展农村电商，着力形成要素集聚、主体多元、渠道畅通、机制高效、规范有序的现代农业产销对接体系。

完善利益联结。加快发展乡村产业，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富裕农民，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要通过科学的制度设计和模式设定，明确企业、合作社、村集体、农户在产业链、利益链上所处环节和所占份额，形成企业和农户在产业链上优势互补、分工合作的格局，增加农民群众的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通过“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充分盘活农村土地、房屋和集体资产等“沉睡的资源”，尽可能让农民参与进来，开辟更多增收门路，让农民更多受益。

加强基层党建。乡村振兴的各项政策，最终要靠农村基层党组织来落实。发展乡村产业、推进乡村振兴，必须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坚持抓基层、强基础、固基本的工作导向，选优配强基层党组织书记，精准选派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把党组织建在产业链上、建在合作社上，推动各类资源向基层下沉。结合实际探索推广“村企合一”“村社合一”等模式，把党建触角延伸到产业发展第一线，不断提升基层党组织领导和服务发展的能力，为产业发展、乡村振兴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提升抓乡村产业发展的精准度和实效性

推动乡村产业发展既需要过硬的能力水平，更需要深入细致的工作作风，必须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坚持抓具体抓深入，大兴调查研究、真抓实干之风，把问题搞透、把路径搞准、把措施搞细，不断提升抓乡村产业发展的精准度和实效性。

深入实际、摸清实情。我国广大农村千差万别，各地发展条件、产业基础大不相同。要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摸清本地区资源禀赋条件和产业发展基础，看清自己的优势和短板弱项。深入开展市场调查，精准确定和细分目标市场，根据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市场需求规划好产业发展布局，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广大“三农”干部要多到田间地头走走，多到农民家里坐坐，切实弄清农业农村的新变化、新需求，掌握更多实情，努力成为推动乡村产业发展的行家里手。

研究问题、破解难题。产业振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每一个环节、每一个阶段都可能遇到困难和问题。要坚持问题导向、发扬斗争精神，越是任务重、困难大，越要知难而上、迎难而上。广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带头深入到困难大、问题多、群众意见尖锐的地方去，到乡村产业推进困难的地方去，找准制约产业发展的瓶颈问题，通过领导领衔、组建专班推进等方式，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解决、一个产业一个产业推进，在研究问题、破解难题中不断发展壮大乡村产业。

扭住不放、一抓到底。产业发展从来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毕其功于一役，必须咬定目标、久久为功。在政策设计上，既要全面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又要结合本地实际，因地制宜、因地施策。在工作部署上，做到周密细致、可操作性强，及时、全面、到位地开展大学习、大培训，使干部干有方向，群众干有方法。在监督检查上，盯住关键少数，抓住关键问题，对落实不力的问题进行追责问责，确保任务高效推进、圆满完成。

（作者系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转自：《人民日报》2021年02月25日第09版）

夯实农业生产基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柯炳生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粮食安全，把解决好吃饭问题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十四五”时期，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重要历史关口，粮食安全问题更是丝毫不能放松。日前，国务院印发的《“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提出，立足国内基本解决我国人民吃饭问题，既保数量，又保多样、保质量，对夯实农业生产基础、提升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水平作出系统安排，充分彰显了端牢中国人饭碗的坚定决心和信心。

一、充分认识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意义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首要任务。增加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是农业的基本功能。不管农业现代化发展到什么程度，这一基本功能永远不会改变。从需求端看，温饱需求是最基本需求，其中刚性最强的需求就是吃饭需求。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别的各种需求都可以暂缓、可以克制，唯有食物需求每天必不可少。从生产端看，由于我国人地关系紧张，粮食安全的压力将在我国长期存在，粮食供求紧平衡将是我国粮食安全的长期态势。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必须首先抓好粮食生产，把确保重要农产品特别是粮食供给作为第一要务。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是维护经济社会稳定的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是实现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任何时候这根弦都不能松；一个国家只有立足粮食基本自给，才能掌控粮食安全主动权，进而才能掌控经济社会发展这个大局。粮食安全问题影响的是 14 亿人口全体，包括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出现粮食安全问题，首当其冲影响的就是城市人口。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是应对国际风险挑战的压舱石。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环境日趋复杂，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广泛深远，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包括粮食等产品在内的国际产业链供应链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日益增加。我国部分农产品对外依存度还比较高，如作为饲料粮的大豆，2021 年进口量达到 9652 万吨。对这类依赖进口的重要农产品，也要稳定提高自给率、拓展多元进口渠道，不能受制于人。

二、提升粮食保障水平面临的突出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发展成就巨大。最突出的标志是，在耕地面积显著减少、人口规模大幅增加的情况下，人均农产品产量大幅度提升，其中粮食增加了50%，肉类增加了5倍，水产增加了8倍，水果增加了19倍。2021年粮食产量继续高位增产，创下13657亿斤的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267亿斤，增长2%，水稻、小麦等口粮自给率超过100%，人均粮食占有量超过480公斤，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37%，肉蛋奶、果菜茶品种丰富、供应充裕，有效满足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这些巨大成就证明，改革开放以来，党领导的一系列农业农村重大改革和方针政策是正确的，是必须要坚持和强化的。

同时也要看到，我国农业发展面临诸多挑战，突出表现在耕地少、规模小、成本高、单产低等方面。“三调”数据显示，我国耕地面积为19.18亿亩，占世界耕地面积的9%左右，其中陡坡耕地和梯田占四分之一以上，土地不足压力将长期存在。我国农户平均经营规模为9.8亩，不到欧盟农场平均规模的5%、美国农场平均规模的0.4%，农业经营者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仅占8%。我国主要粮食作物单产水平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同发达国家比较仍然差距很大，其中小麦单产约为欧洲的80%，稻谷约为美国的80%，玉米和大豆约为美国的55%。展望未来，我国农业生产面临的突出挑战，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如何用越来越少的耕地、越来越少的水资源、越来越少并且越来越贵的农业劳动力，生产出更多、更好、更安全的农产品。

三、提升粮食保障水平的重点任务措施

《规划》提出，“十四五”时期，要实现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有效保障，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产量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为实现以上目标，必须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和重要农产品保障战略，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要求，健全辅之以利、辅之以义的保障机制，夯实农业生产基础。

稳定粮食播种面积。这是基础性要求。要落实地方政府抓粮食生产的责任，《规划》强调压实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完善粮食安全责任制，细化粮食主产区、产销平衡区、主销区考核指标，完善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鼓励粮食主产区主销区之间开展多种形式的产销合作。这就再次明确粮食生产不仅是主产省的责任，而是各地共同负责，要共同加强粮食生产能力建设，守住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底线。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规划》提出完善粮食生产扶持政策，稳定种粮农民补贴，完善稻谷、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和玉米、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扩大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实施范围，支持有条件的省份降低产粮大县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保费县级补贴比例。

加强耕地保护与质量建设。18 亿亩耕地必须实至名归，这是从更长远的角度来强化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生产能力建设。要严格数量保护，《规划》要求坚守 18 亿亩耕地红线，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加强耕地用途管制，实行永久基本农田特殊保护。建立健全耕地数量、种粮情况监测预警及评价通报机制，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严格管控“非粮化”。永久基本农田重点用于发展粮食生产，特别是保障稻谷、小麦、玉米等谷物种植。强化质量建设，《规划》提出提升耕地质量水平，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加大农业水利设施建设力度，实施国家黑土地保护工程，推进耕地保护与质量提升行动，加强南方酸化耕地降酸改良治理和北方盐碱耕地压盐改良治理。在耕地占补平衡方面，不仅数量要平衡，也要有质量要求，严禁以劣补优。

保障其他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人民群众消费需求结构加快升级，对肉禽蛋奶水产和果菜等方面需求日益增加。《规划》提出，要发展现代畜牧业，健全生猪产业平稳有序发展长效机制，防止生产大起大落。实施牛羊发展五年行动计划，大力发展草食畜牧业。加强奶源基地建设，优化乳制品产品结构。加快渔业转型升级，保持可养水域面积总体稳定，推进水产绿色健康养殖，到 2025 年水产品年产量达到 6900 万吨。促进果菜茶多样化发展，强化“菜篮子”市长负责制，构建品种互补、档期合理、区域协调的蔬菜供应格局，因地制宜发展林果业、中药材、食用菌等特色产业，提升茶业发展质量。

优化农业生产布局和协同区域农业发展。从农业生产尤其是作物生产的自然条件特点出发，《规划》对农业生产区域布局作出部署。加强粮食生产功能区建设，加大对水稻生产功能区、小麦生产功能区、玉米生产功能区等政策支持力度，打造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加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建设，稳定提升大豆、棉花、油料、糖料、天然橡胶等重要农产品生产能力，提高国内自给水平。加强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发掘特色资源优势，建设一批特色农产品标准化生产、加工和仓储物流基地，培育一批特色粮经作物、园艺产品、畜产品、水产品、林特产品产业带。

此外，针对农业面临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规划》提出，增强农业防灾减灾能力，强化农业气象服务，健全动物防疫和农作物病虫害防治体系，加强监测预警网络建设。提升重要农产品市场调控能力，深化农产品收储制度改革，加快培育多元市场购销主体，加强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监测预警。开展粮食节约行动，有效降低粮食损耗。稳定国际农产品供应链，实施农产品进口多元化战略，健全农产品进口管理机制，稳定大豆、食糖、棉花、天然橡胶、油料油脂、肉类、乳制品等农产品国际供应链。

（作者系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乡村振兴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转自：《农民日报》2022 年 2 月 19 日）

乡村振兴须谨防五大误区和谨记六大要点

陈 杰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指出，乡村振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是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在调研一些中西部地区乡村振兴工作中，笔者既感受到乡村振兴工作的热气腾腾，也感受到基层对乡村振兴工作的一些困惑乃至误解。

乡村振兴需要谨防五大误区

第一个误区是以增加乡村人口为目标。一些基层干部，认为乡村振兴的标志是本乡本村人越来越多了，就是兴旺了，就是振兴了。笔者认为，这个思路是错误的。乡村最大的矛盾是人地矛盾，吸引几个人回乡可以，吸引太多青壮年回乡，一定出乱子。乡村振兴是要把人均收入提上去，而不是把规模做上去。不要被所谓农村“空心化”的说法误导，事实证明，农村空心化（青壮年都外出了、只留老人妇幼在家）确实带来农村衰败，但并没有带来农村崩溃，农村没有乱。大量农村青壮年、剩余劳动力进城了，把就业压力、治安压力、维稳压力转移到城市，然后通过打工收入反哺滞留农村的父母妻儿，保障后者的生活水平也有所提高，这也许不是最优，但起码是次优。决不能做大而不强的乡村，更不能以考虑乡村回流人口作为振兴考核指标。乡村振兴一定是减少农民而不是增加农民，一定是减少非农就业而不是增加农业就业。所以，乡村振兴绝对不是逆城镇化，而是要与新型城镇化国家战略紧密协同，共同促进高质量城镇化的实现。

第二个误区是以扩大产业规模为目标。乡村产业，首先要环保、生态，其次才是要赚钱、能切实给农民增加收入，第三是解决就业，尤其是“老弱病残”的就业。但目前来看，乡村就业压力并不急迫，主要是增收压力大。片面追求乡村产业规模，把乡村看作是城市之外的又一个生产基地，就违背了乡村与城市的分工体系。乡村振兴是为了生态（环境生态、社会生态、文化生态），而不是为了生产。振兴什么样的乡村产业，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要想清楚，是解决就业问题，还是解决收入问题；收入方面，是解决农户个人收入，还是集体收入、政府收入，这直接涉及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还是资源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或技术密集型产业。不同产业的效果很不一样，需要的政策扶持也很不一样。

第三个误区是所有乡所有村都要振兴。乡村振兴是整体上的振兴，不意味着所有乡村都一定要保留、都要振兴。有条件的、基础好的特色村，应该支持做大做强和鼓励周边乡村向其靠拢乃至合并。基础条件很差、地处偏远的村落，要努力动员整村迁居。动员不了，也起码顺其自然，全国已经有数万个自然村消失，该消失的村庄就要让其消失。

第四个误区是将振兴与脱贫相互混淆。脱贫解决的是绝对贫困，乡村振兴是长期事业，包括一部分绝对贫困的脱贫，但更多解决的是相对贫困。相对贫困是不可能完全消失的，只要有人在，就有差别和分化。希望一次分配就抹平差别，不客观不现实，违反经济规律。只能通过二次分配来缓解初次分配的差别分化。

第五个误区是政府要背负所有的责任。政府对脱贫和保障基本生活水准有责任，对秩序治理和提供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有责任，但对乡村能否兴旺，尤其是具体某个村、某个乡的产业能否兴旺并没有责任，不能做无限政府。基层社区可以通过政府公共服务购买引入社会组织社会力量，但并不应该具有“造血”功能，就应该以转移支付和保障功能为主。村干部乃至乡干部都不应该承担经济发展的职责，客观上没有这个能力，不能没有条件也要上。基层干部管经济，自背包袱，越陷越深。同时，各种补助要量力而行，做到可持续发展，财政压力已经越来越大，不能盲目高标准和高承诺。

乡村振兴需注意六大要点

乡村振兴要有耐心。脱贫要跑步前进，是救急救火，等不得缓不了。但乡村振兴说到底是乡村现代化，现代化是一个很长的过程，急不得。人的现代化是核心，农民不能现代化，就没有乡村现代化。但人的现代化，需要很长时间。要科学振兴，顺从规律。乡村振兴需要顶层设计，需要规划和谋划，要稳扎稳打。乡村振兴中的产业振兴尤其需要，不能着急，不能为短期内出成绩而盲目上马项目。产业振兴看准了再做，有条件再做，不能没有条件也要创造条件硬上。全国总体来说产能过剩，乡村人才技术相对匮乏，找到市场空白点很难。农民个人或村庄集体自己愿意做，尽管放手，但政府不能冲在前面，干部不能介入太深。财政投乡村产业，风险更大，难度更大，很难看得准。看不准的时候，宁可慢一些，缓一些。

乡村振兴要先易后难。乡村振兴五个目标：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但不是说一定要按照这五个目标的先后顺序去做。先把基本公共服务和公共设施做好，生态好了，宜居了，乡风好转了，治理改善了，吸引几个能人回乡就好办了。乡村振兴五个目标中最难的是产业兴旺，产业兴旺要等机遇，水到渠成再做。互联网等新技术会带来机遇，城市网络扩张、城市产业与市民需求升级会带来机遇。

乡村振兴要真正为农民着想。做工作要避免做表面文章，多问问农民真的要什么。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和主体性。产业兴旺要真正创造农民收入、增加乡村集体财力，这样的产业兴旺才能带来农民生活富裕美好。

乡村振兴一定不能跟新型城镇化割裂开。从各国经验看，“三农”问题的解决，最终都是通过减少农民和增加非农就业来实现。“工业化创造供给，城镇化创造需求”。加速城镇化，才能增加需求包括服务型需求，增加就业机会。乡村振兴不能丢掉2014年国务院提出的“三个一亿人”目标：到2020年，要解决约1亿进城常住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约1亿人口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约1亿人口在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乡村振兴要结合城市群、都市圈的发展，接受城市文明的溢出和人财物技术的辐射。

乡村振兴要从集聚中要效益。城市的灵魂是集聚，集聚给城市带来了生产力和效益。乡村振兴也要从推动集聚中获得效益。推动乡村合并，定居点集中，增加公共服务共享，以此降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建造与维护成本，实现可持续发展。乡村产业要实现生态环保基础上的兴旺发达，也必然要走规模化和集约化之路。只有集聚才能产生规模化和集约化效益，若干乡村共同成片建设开发区或特色农林业、生态旅游业，规模化经营，将不利区位变成有利区位，增加资源共享，降低中间投入品成本，加强配套服务能力，提高产品竞争力。

土地制度改革是乡村振兴的前提。乡村最大的资源就是土地，积极寻求农村土地制度创新，要善用土地资源。《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修正案（草案）提出，在符合规划前提下，集体用地无需征收即可直接入市。这对乡村振兴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契机。各地应该借此机遇加快吸引城市资本下乡，加快集体建设用地直接入市。但同时提倡以集体建设土地入股，获得长期租金收入。各地还要完善对被征地农民合理、规范、多元保障机制。总体规划、详细控规也要与时俱进，更好发挥市场化配置机制潜力。对于农村建设用地的土地用途管制适当放松，实施负面清单禁入管理，建立非利益相关第三方公众委员会审批机制。推动宅基地集中置换，城郊地带鼓励宅基地建设租赁住房出租。

（作者：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公共经济与社会政策系长聘教授。来源：中国经济时报，2021年08月27日）

实施乡村建设行动的战略任务与实现路径

秦国伟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把乡村建设作为“十四五”时期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点任务，摆在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位置。我国应举全党全社会之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为实现“农业高质高效、农村宜居宜业、农村富裕富足”目标持续发力。

我国实施乡村建设行动的现实基础和面临挑战

经过8年持续攻坚，我国如期打赢了脱贫攻坚战，近1亿贫困人口实现脱贫，832个贫困县、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动态清零”，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人均纯收入从2015年的2982元增加到2020年的10740元，年均增幅比全国农民收入高20个百分点。我国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彻底解决，这是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力度最大、效果最为显著的减贫行动。同时，我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农业质量和效益取得实质性跨越，贫困地区基础设施显著改善、公共服务水平明显提升、经济社会加速发展、精神面貌明显变化，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更加巩固，这为做好“三农”工作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积累了宝贵经验和奠定了初步基础。但同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目标看，当前我国实施乡村建设行动主要面临五大挑战：

一是城乡融合发展和脱贫攻坚成果需要进一步巩固拓展。当前，我国脱贫省（市、区）产业基础仍不牢固、发展水平还不平衡还不充分，部分脱贫省（市、区）农业产业经营风险较大、农村基础设施“欠账”还比较多，民生保障水平需要进一步提升、乡村治理能力亟需提升。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基础上，强化乡村建设规划引领、加强乡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乡村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全面促进农村消费、加快县域城乡融合发展、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保障措施与机制方面都亟待进一步完善巩固。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巩固农村改厕、生活垃圾处理、污水治理成果，进一步提升村容村貌上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二是维护粮食安全、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条件仍然薄弱。疫情和全球外部环境充满不确定性下，我国维护粮食安全、实现高质量保供面临较大挑战。稳步提升粮食产能、全面压实耕地保护的数量、质量责任，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面临的阻力、难度越来越大。强化种业自主创新能力和种业企业的竞争力，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因地制宜培育壮大优势特色产业、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调动农民种粮的积极性，调整优化农业结构、增加绿色优质产品供给的基础还比较薄弱。

三是实施乡村建设行动的制度体系不完善。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城市和农村的循环在整个国内大循环中是弱项。城乡循环不畅最大的梗阻环节在农村，产业循环链条上最薄弱的环节为农业，投资和消费循环上最脆弱的部分是农民。在新发展格局背景下，我国

实施乡村建设行动，特别是强化乡村建设规划引领、强化乡村振兴投入保障，推动人才、土地、资本等要素在城乡间双向流动和平等交换的制度体系还不够完善。坚持市场和消费导向、创新产业组织方式、推动种养业向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和绿色化方向发展，为乡村建设注入新动能的制度体系亟待建立。

四是适应新阶段要求实施乡村建设行动的力量体系亟待建立。新发展阶段，我国围绕“保供固安全，振兴畅循环”，在全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副产品有效供给、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政府—农民—市场”互相支撑的力量体系亟待构建。在尊重基层群众意愿的基础上，发挥市场的逻辑、资本的力量在推动农业技术、模式、产品和服务等方面的创新升级，推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和种业发展、打好种业翻身仗上还有很大空间。为乡村建设引入社会资本，同时充分发挥金融、保险、期货、再保险等政策工具推动城乡融合发展、要素平等交换还需要进一步激发动力。

五是乡村建设行动中信息化水平和人才队伍建设相对滞后。目前，我国城乡间的“数字鸿沟”还比较突出，快递进村、农村电商需要进一步提质增效，“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还有较大提升空间，城乡数字冷链物流建设刚刚起步。同时，乡村“人才洼地”的现状还没有根本改变。农业生产经营人才缺乏，高素质的农民队伍和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带头人总量不足、结构不优。农村二三产业发展人才缺乏，特别是乡村规划建设人才、农村电商人才、乡村工匠和文化旅游服务人才。乡村公共服务人才、治理人才和农业农村科技人才亟待培育和增加。同时，激发乡村现有人才活力、支持乡村人才创新创业的政策配套和市场化激励不足，支持乡村人才振兴的体制机制亟待构建并细化。

实施乡村建设行动的重点任务和路径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三农”工作重心发生历史性转移的背景下，应着力聚焦我国“乡村建设行动建什么”“谁来建”“怎么建”等关键环节，全面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力争见到明显成效，让乡村面貌看到显著变化。

一是注重衔接“两大战略”，在衔接中推进融合发展。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基础上，推进工作衔接、政策衔接和机构队伍衔接，做到思想不乱、工作不断、队伍不散、干劲不减，确保如期完成过渡期的主要任务，确保衔接工作平稳有序。根据我国各地农村发展的阶段和实际，给予更加精准的支持帮扶、考核引导。根据主要特点分类别按照先行示范、重点推进和持续攻坚差异化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在脱贫县实行“四不摘”政策，落实中央五年过渡期政策期间，重点围绕农村人居环境提升、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发展等三大领域，全面改善农村水、电、路、气、房、讯等设施，推进县乡村公共服务均等化，提升发展水平、治理水平和均衡水平。将脱贫地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脱贫县农村低收入人口常态化帮扶、县域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一体化，乡村建设规划水平、传统村落和特色风貌保护情况，激发群众参与乡村建设的内生动力和乡村活力，吸引社会力量投入乡村建设行动等作为重要的考核指标，予以预期引导。

二是统筹“安全与发展”，确保粮食安全和推进绿色发展。从统筹发展和安全大局出发，坚持扛稳国家粮食安全重任和实现绿色发展。加强和改进建设占用耕地占补平衡管理和打造种业强省。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非粮化”，守住耕地红线，探索实施“田长制”实施高标准农田改造提升工程、健全管护机制。严格新增耕地核实认定和监管，开展补充耕地第三方不定期随机核查和入库管理。以破解“卡

脖子”技术为突破口，加快形成以市场为导向、企业为主体、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体系，打造种业强国。推进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抓好化肥农药减量、白色污染治理、畜禽粪便和秸秆资源化利用，抓好长江流域十年禁渔，推进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开展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综合改革试点。选择部分省（市、区）开展绿色发展产业合作区试点，打造“三品一标”知名品牌，开展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探索建立绿色农畜产品标准化的生产标准、环境标准和品质标准，在农畜产品产前的环境监测、产中的标准监督、产后的加工与销售前后衔接实施。探索形成企业和农户产业链上优势互补、分工合作的格局，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同时把增值收益更多留在县域的实现机制。

三是坚持优先发展，完善支持乡村建设行动的制度体系。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完善乡村建设行动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和强农惠农政策体系。完善支持乡村建设行动的改革政策体系。用好深化改革这个法宝，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和维护农民权益，把选择权交给农民。围绕推动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深化新一轮农村改革，着力激发农业农村发展动力活力。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持续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探索适宜我国各地不同实际的土地流转模式，发展多样化的联合与合作，推进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建设。鼓励各企业主体与小农户建立契约型、股权型利益联结机制，带动小农户专业化生产，提高小农户自我发展能力和抵御自然风险能力。

四是突出改革创新，构建乡村建设行动的主体动力体系。坚持市场导向，遵循市场规律，通过市场化手段培育实施乡村建设行动的主体。在我国因地制宜、分区施策，开展不同区域的“乡村建设行动主体培育”试点，推进城乡融合发展。鼓励东、中、西部省（市、区）探索符合实际的现代农业经营方式和农民收益分配方式，在经营主体、村集体和农户间建立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培育乡村建设行动主体。探索设立县域“农业投资公司”，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注重运用市场的逻辑、资本的力量来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拓展农业全产业链，实现稳产保供、增强乡村产业竞争力，推动农业提质增效。围绕让农民得到更好的组织引领、社会服务、民主参与，创新党组织领导的基层乡村治理类型，从根本上提升农民的主体地位、组织程度和市场化能力，走出一条内生型乡村建设行动新路子。

五是突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强磁场吸引人才活水。围绕解决好“人”的问题，培养和吸引人才投身乡村建设行动。充分发挥新基建在乡村建设行动中的先导作用。因地制宜、分区分类施策，将乡村作为新基建的重要战场。围绕农村产业、服务、治理、文化等进行以应用场景为核心的数字应用系统布局，将促进农村基础设施提档升级，补齐乡村数字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短板，激发乡村建设行动的新动能。吸引更多年轻人走进乡村、熟悉乡村、了解乡村进而热爱乡村、回归乡村、建设乡村，在服务中选择“留村”创业创新。选择部分省（市、区）开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试点，增强吸引人才物质基础。在充分尊重基层和群众创造的基础上，鼓励试点地区结合实际，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通过完善乡村建设行动政策体系，支持各地发展不同类型的休闲农业、乡村旅游、餐饮民宿、文化体验、电子商务等新业态，在不断壮大新型集体经济中实施乡村人才振兴战略，增强乡村发展的活力，吸引一大批“新乡贤”回村和城市人进村，源源不断注入人才活水，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作者供职于安徽省林业局，来源：《中国发展观察》2021年第23期）

当五条人遇见大南坡：镜头会记录下的诚实

凌 敏

大南坡村位于河南焦作市修武县，是魏晋竹林七贤吟咏地——云台风景区附近的山谷坡地中的一片农庄，上世纪70年代因煤炭开采积累了财富，还留下了一定数量的公共建筑。后来煤炭开采结束，经济迅速滑落，成为了省级贫困村。

2016年，修武县委县政府首创“县域美学”的发展道路，不断聚合当地历史、文化、旅游与风物资源，用美学留住乡愁，以文化艺术复兴乡村。乡建学者、出版人和策划人左靖受县委委托，邀请来自区域内的设计与思想力量，以在地营造的方法，展开“大南坡计划”。

只是去一个从来没去过的故乡，唱歌吗

在看《中国这么美》之前，内心实在是存疑的。联想片子标题与主题，当“音乐”遇见“在地”，尤其是乡村，不确定它是否只是一个把拍摄场地挪到乡村的《乐队的夏天》。

毕竟在自然山川之间记录音乐实在是一种讨巧的做法，但那样的“乡村”只是另一种城市物产的“背景”罢了。

带着问题打开第一集，最初的想法抹除大半。和乐队本身相比，生活在当地的人和他们的故事实在是生动可爱、有层次许多，或许因为他们呆在自己天然属于的场域，也或许是因为我天然地对乡村存在感情和好奇。但那时依旧不太明白的是，看似节目有努力将乐队和乡村“撮合在一起”，但他们还是用着各自的语言，说各自的话。

山河很美，美得不真实。乡村的生活很真实，真实得只能和自己相处，真实得有点寂寞。

十月份亲历了五条人乐队的大南坡之行，大概也知道这次有拍摄团队跟随记录，所以在活动现场能感受到一大个团队的“阵势”，却不知道他们以什么样的视角记录下了什么。直到看到片子开头，导演王圣志在高铁上跟五条人说，我先前没看过你们的资料，对你们不了解，一下子放下心来，因为我对五条人的音乐也不够了解，看起来它不妨碍我从镜头的视角，再感受一遍。

短暂的交集，除了热闹还会带来什么

我在2020年杭州的草莓音乐看过五条人的现场演出，那时他们已经因为《乐队的夏天》火遍全国上下。准确地说，他们是因为是他们自己，而受到那么多人的喜欢。节目是一个契机，镜头也是，它只会照出本就存在的东西。

这次去大南坡算是为了近距离看看乡村，也顺便近距离看见仁科、阿茂和小河。

一个小时的片子，真实展现了我在两个月前看到过的一切：满树柿子、满地玉米、经过修葺的公共空间、售卖本地物产的供销社、两场把寒冷的北方夜晚变得不那么寒冷的演出、还有许许多多眼熟又可爱的当地人。

当然也有一些我错过的部分：比如五条人、小河与孩子们的音乐课堂、孩子们在歌声中作画的场景、五条人和牛爷爷用餐时的交谈、还有他们与怀梆剧团的交流和磨合。

镜头的画面绝对真实吗？被摄像机簇拥的交互，又会有多“走心”？

曾在讲述纪录片的书《生活而已》中看到这样的解释：“哪怕受访者面对着镜头撒谎，被记录下的那一瞬间也是真实的。我们不能指望被摄者当作镜头完全不存在，但那也不妨碍镜头记录真实。”

仁科在刚到大南坡时也说，他早就习惯了镜头的存在。

那两天或许是大南坡在一年里最热闹的日子（除了春节之外），在这一两年里，因为这个乡村建设的项目，许多年轻人回到家乡，拥有了新的、不必离家太远的事业或工作。也有许多周边城市的年轻人奔着看看五条人或小河的目的而来，加上左靖老师邀请来的文化界人士与乡村工作者，大南坡可能迎来了它最富生机的时刻之一。

唱歌的人，是否能听见乡村的声音

音乐人来到乡村，不过就是换了个地点唱歌。这是我最开始对这个节目难以提起兴趣的原因，但五条人与大南坡的互动还是随着节目的推进慢慢转变了我的设想。说起来奇妙，真诚就像是空气，你看不见它的存在，但当你深切地被它包围时，就会意识到它的渗透和力量。

比如我感觉到了五条人对乡村的体认和同理心，但如果问我要明确的证据，我找不到，又觉得到处都是证据。

在大南坡时，音乐主角除了五条人、小河，就要数当地怀梆剧团的演员们和孩子们。在大南坡的两天里，演员们盛装登场、配合拍摄、带着或许有的一点点不自信，一次次登上舞台。戏装的衣箱一封就是四十年，村里再没有需要他们登台的场景，直到一张属于他们的唱片终于要发行了。

外来的“客人们”围着演员们要签名，他们在祠堂门口排练时，五条人就作为观众在旁边听。仁科会因为老人们的经历而联想到自己的经历。五条人在牛爷爷家吃饭时，也不是“我们唱首歌给你听吧”，

而是“我们想听你唱一段。”

他们不再是盛景的陪衬，他们就是盛景。

这符合我对外来人与乡村交集发生形式的理想设想。音乐人缺少舞台吗，大概率是不缺的，一年大半时间都在各个城市演出的乐队，他们需要的其实是停歇与补充，如果“回到大地”又变成了一场光秃秃的表演，那既是以“正确之名”对音乐人的又一次消耗，也是对乡村本身养分与魅力的无知。在一年大半时间都在为真实生活而忙碌的当地村民，他们需要的才是被看见与被听见。

仁科把到访大南坡的经历形容为“今天的故乡”。“故乡”两个字基于在地的感性，“今天”则展露他对“时效性”的清醒。他知道能做的有限，交集短暂，也知道喧嚣后有很多关注会散去，但这未阻挡他在美好的可能中多加一笔，真诚的一笔。

他或许悲观，但这种悲观生长在真实里，能带来的改变可能才更加积极。

是“真实”更美，还是“美”更美

老实说，作为南坡秋兴的亲历者，看到大南坡村的第一眼并不是“美”，就像左靖老师在采访里表达的那样，大南坡在中国的那么多村庄之中，实在是很普通的一个。但正因为普通，才给在地的实践者带来考验，也才印证乡村工作的确有发挥它的作用。

乡村的“美”就像糖水的“甜”一样，实在是不需要确证的事。

就像很多不明就里的人会感叹，老了就去乡下，找一块地，种田盖房子，这样的生活多安逸，过分美化的影像正在催生和加剧这样的愿望（也可以说是臆想），但这恰恰和许多真实生活在乡村的人的愿望是反过来的。

乡村不是为城里人的臆想而存在的，它真实地生长着、也真实地遇到了困境。张晓舟说：“中国这么美，我就怕你们把乡村拍得太美了。”

乡村正面临的是什么呢？

是老宅的空心、是青年人的出走、是交通的不便、是教育的匮乏、是记忆的被忘却、是传统的被封存，是生活的苦涩在时刻美化、回避的长焦镜头中一次次被消解，但那苦涩本身，并未得到消解。

左靖在大南坡村做乡建，加之先前的其他经历，对这一切应该最有发言权。但他似乎时时克制，很少表露情绪，甚至看起来有些严肃。他只埋头做事，聚拢更多的人来到乡村。

来看它的美吗？更多的，应该是来看它的真实。

而这集片子剪辑得也像画面里那些欲言又止的中年男人一样，含蓄而克制。在片中，音乐不是煽情的帮凶，只是一艘艘帮助“真实”抵达“真实”的船。

更好的乡村一定不是在相信它已经足够好的人手上建成的。警惕“美”可能才是另一种清醒。

无可否认的是，大多数的“我们”，还是只能因为“他们”而关注“他们”

左靖和五条人是十多年的老朋友了。

十多年前，五条人还没有像今天一样，走到哪里都会被认出来，但那时他们已经关注乡村、行走在乡村，并在自己的作品里演绎他们感受到的在地的真实。所以当他们来到大南坡，被要签名的观众围得水泄不通时，老朋友左靖略带严肃地提醒他，别忘了我们这次的目的是“向大地出发”。

仁科是幽默的，幽默中又带着挥之不去的忧伤。在读书的他还没成为一道风景之前，书就是他的伙伴，可现在大家都会用调侃的语气强调：“仁科真的是读书人来的”。

他的语言和表情不羁而洒脱，却也意味深长地直面演出和生活的矛盾，他说：“你只能用空虚去刺那个满足，用满足来抵抗空虚。”

十多年后，左靖还在做乡建，五条人也还在用音乐唱生活。他们依然是相知的朋友，好像一切都未曾改变那样。当然变化也已经发生了，许多人因为五条人而关注大南坡，又因为大南坡、因为乡建而重新理解五条人。

在片中他们也很知晓这样的变化，并接受了那个新的角色和意义。他们没有因为时代的浪潮卷到他们这里就转变了方向，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的作品从来都是真实地扎根于土地，才会在在村庄的中心唱响时，得到真切诚恳的注目与快乐。

但那又何妨

如果说“到来”和“关注”是一场注定的交换，那当它是在对的人事件发生时，已经预示了结果的美好。

就像你可能是因为“五条人”而打开那集纪录片，但你看到的除了音乐人的才华，还有催生这一切的真实的土地。看到的是一个鲜活又熟悉的河南乡村，看到它可以更鲜活更美好的许多可能，看到围绕它生发的诸多故事，当然，你也会看到五条人面对乡村和土地的真实和谦逊。你可以看到质朴的情感随着音乐流动，看到舞台的光点落在孩子们盈满笑意的眼睛里面。

哪怕我们会因为“到底还是要因为音乐人而关注乡村”而遗憾，却也无妨因“但毕竟还是没遗漏这珍贵”而感到欣慰和欣喜。

就像钱理群先生曾说的：“我们需要乡村，乡村需要我们。”承认这种“互相需要”并不是让人难为情的事。毕竟最让人难过的不是关注乡村的人并非纯粹只想关注乡村，而是无论什么样的理由都再唤不起“城里人”对乡村的好奇。

它依然是可贵的征兆。

（作者供职于澎湃新闻。本文为澎湃新闻艺术评论-艺术与乡建栏目）

推进农业标准化，更好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

陈晓华

农产品质量安全首先是“产出来”的，产出放心的农产品关键要靠农业标准化。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到，开展农业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提升行动，推进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完善全产业链质量安全追溯体系。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陈晓华围绕“推进农业标准化，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提出相关建议。

一、农业标准化成效显著，但水平仍偏低

陈晓华表示，从调研看，这些年农业标准化取得了积极成效。目前，我国农兽药残留国家标准超过1.3万项，农业行业标准5000多项，各地创建“三园两场”（果菜茶标准化示范园、畜禽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1.8万个，认证绿色有机地理标志农产品近5.9万个。实践证明，农业标准化有效促进了农业集约化、绿色化、品牌化协同发展，有利于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但与此同时，我国农业标准化与老百姓的期待比，与农业高质高效的要求比，与发达国家发展状况比，水平仍然偏低。陈晓华介绍，差距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标准体系不完善，结构不够合理。欧盟有15万多项农药限量标准，日本有5万多项，美国有1.2万项，我国农业生产标准的数量还比较少，特别是特色小宗作物、小品种动物及水产品的限量标准缺失比较严重。而且，标准制定主要集中在安全方面，对绿色发展、品质提升、营养健康等关注得不够。二是制标用标“两张皮”，标准化推进困难较多。标准化生产一定程度上会增加成本，由于农产品优质优价还没有完全实现，影响了标准化生产技术的推广应用。政府对标准化生产的支持也存在“撒胡椒面”或“人为垒大户”问题，标准化推进参差不齐。

二、加大力度，以农业标准化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强化绿色导向、标准引领和质量安全监管”。为此，陈晓华建议，应当以更大力度推进农业标准化，切实把农业产前、产中、产后各个环节纳入按标生产、依标监管的轨道，以农业标准化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

一是把农业标准化纳入农业农村现代化指标体系。中央层面要做好顶层设计，在农业农村现代化指标体系中明确农业标准化要求，抓紧编制农业标准化发展专项规划，把标准化作为现代农业发展的关键环节和主攻方向进行布局。推动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农业产业园区、大中城市郊区以及有条件的“菜篮子”大县等率先实现标准化生产，压实地方责任，把标准化生产纳入对地方党委政府乡村振兴、食品安全等考核体系。各类农业示范园区建设、生产项目资金安排、产品品牌认证等都应与农业标准化挂钩，作为重要评审依据，形成推动农业标准化的倒逼机制。

二是构建与农业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标准体系。坚持“有标贯标、无标制标、对标达标”，做好标准领域补短板、强弱项工作，拉出清单目录，组织团队研究，抓紧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营养品质、包装分级、绿色发展、小宗品种等方面标准，加快构建农业高质量发展标准体系。支持各地和各类行业组织围绕主导品种和特色产业制定生产技术规程，并与生产指导、技术推广相结合，针对性开展技术培训，通过明白纸、生产挂图等形式加强对农民的宣传教育，让农民一看就懂、一学就会，使生产标准和规程落地见效。

三是建立农业标准化示范带动机制。持续开展农业标准化示范创建，发挥新型经营主体带动作用，支持合作社、家庭农场、种养大户及龙头企业等创建现代农业全产业链标准化示范基地，实现标准制定、组织实施到跟踪评估的一体化推进，以点带面，带动全产业链标准化。发展“公司+基地+农户+标准”“合作社+农户+标准”等模式，把标准化嵌入投入品管控和作业流程，通过社会化服务、托管农业、订单农业等，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有机衔接，引导一家一户小规模生产步入标准化轨道。

四是加大农业标准财政经费支持力度。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作用，中央层面按标准制定计划，稳定安排项目保障资金，并统筹设立现代农业全产业链标准化转移支付项目，每年选择部分“菜篮子”大县，对农民按标生产、减肥减药、绿色防控等给予补贴。各级财政增加资金支持农业农村部门开展绿色、有机和地理标志农产品相关原料和生产基地、标准化示范基地建设，组织开展全产业链标准体系试点。加快健全农业标准化工作机构和专业队伍，并保障必要的工作和人员经费，建立农业标准化工作激励机制，对工作突出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表彰奖励。

（作者：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来源：中国农村网，记者：杨宗辉）

《农业与工业化》：中国人的经济理论创新

张蓝水

【摘要】：20 世纪 40 年代，中国学者张培刚在美国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成为发展经济学开山之作，张培刚是世界发展经济学奠基人。由于历史的原因，张培刚回国后有 30 年与经济学失之交臂。论文《农业与工业化》主题是农业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问题，切中我国国情，改革开放才成为人们手中的藏宝图。

我国著名农业经济学家郭书田老先生说，他在给大学生讲中国国情课时，常介绍 4 位从理论到实践一生关注和研究农民问题的前辈：梁漱溟、宴阳初、费孝通、张培刚，要向他们学习。张培刚是世界“发展经济学”奠基人。他立论的那本书是 1945 年 10 月完成的美国哈佛大学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是 20 世纪 40 年代中国学者的经济理论创新，对发展中国家社会转型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一部“发展经济学”开先河的著作

张培刚（1913.07.10~2011.11.23）的博士论文《Agriculture And Industrialization》是世界经济学人首次就农业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研究专著，奠定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理论基础。1947 年获国际上知名的经济学“威尔士奖”。1949 年，作为《哈佛经济丛书》第 85 卷，哈佛大学出版社首出英文版。总编辑迈克尔·费希尔盛赞为丛书中最具影响力的巨著之一。1951 年西班牙文版在墨西哥问世。直到成文近 40 年的 1984 年，才由华中工学院出版社推出《农业与工业化》中文版。

《农业与工业化》国际名望甚高，世界经济学界称之为“发展经济学”的开山之作，张培刚是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人。1982 年世界银行专家 Hollis Chenery 教授在上海讲学时说“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是你们中国人培刚·张”。然而，自 1946 年回国后，张培刚在很长时间里没能从事经济学研究工作。由于与国外学界的长期隔绝，以致被那个时期世界经济学领域所不知，他也不知“发展经济学”在国外悄然“趋热”。因为对“发展经济学”的贡献，刘易斯与舒尔茨荣获 1979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英国经济学家威廉·刘易斯（William Arthur Lewis）1954 年 5 月面世的《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论文，提出发展中国家贫困及经济发展速度缓慢内在原因的“二元经济”模型理论。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舒

尔茨(Theodore W. Schultz)20世纪50年代提出人力资本论,认为人力资源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原因,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国内谈经济发展的书籍和文章,离不开刘易斯、舒尔茨的论述,却很少见引述1945年张培刚在《农业与工业化》阐发的发展经济学思想,不能不说是我国经济学界的缺憾。

发展经济学是20世纪40年代后期,在西方国家逐步形成的一门综合性经济学分支学科,是主要研究贫困落后的农业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经济学。这种农业与工业兼顾的经济学理论模式,在20世纪50年代后逐渐自成一派,称作发展经济学。历史不容假设。若自博士始一直全身心投入经济学教学、研究,也许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会有我们中国人张培刚?!

张培刚1940在昆明考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时的导师、著名经济学家陈岱孙说,《农业与工业化》是为“二战”后新兴经济学分支“发展经济学”开先河的著作。

30年未事经济学的哈佛博士

张培刚,1913年生于湖北省。1930年秋进入武汉大学经济系,1934年夏毕业,被选送当时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从事农业经济调查研究工作,积累了6年的学术实践功底。1940年在昆明考取清华大学庚款留美公费生,1941年9月进入美国哈佛大学研究生院,当时哈佛经济学科处全盛时期,大师云集。选读张伯伦(Edward H·Chamberlin)《垄断竞争理论》和约翰·D·布莱克(John D·Black)《农业经济政策》等课程。1943年获硕士学位,攻读经济学博士,接受“农业国实现工业化”研究课题。1945年10月获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谢绝“哈大”和联合国聘请,1946年8月回国到武汉大学任教兼经济系主任。1947年兼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4月成为1946-1947年度哈佛大学经济学最高荣誉奖“大卫·威尔士奖”获奖的亚洲第一人。1948年1月,受聘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顾问。1949年2月辞去联合国的顾问和中研院的研究员职务及哈佛大学任教邀请,回到武汉大学任校委会常委兼经济系主任。

1952年,认为他学的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教书用不上,调他筹建华中工学院,自此约30年脱离经济学领域。1989年,学术界认为发展经济学走向衰落,他发表《发展经济学往何处去》论文,为发展经济学正名助力。1998年,张培刚始任发展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和工商管理学博士生导师。晚年任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名誉院长、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名誉会长,中美经济合作学术委员会中方主席等职。

张培刚1946年、1949年初两度回绝了哈佛大学任教邀请和1949年初联合国职务的挽留,回到武汉大学。1951年前中国经济学领域璀璨的这颗星,直到1989年人们在6月号《经济研究》杂志才重见其闪光。

《农业与工业化》的重大学术贡献

《农业与工业化》长达 20 多万字，是世界第一部以农业国工业化为主题的研究专著。其最大的闪光点是在国际上首次提出农业国的出路在工业化。张培刚披露：“论文的意义，在于为落后国家，农业国家，如何走向工业化现代化，起一个指导性的作用。”该书提出许多独到而精辟的论断，最早建立了适合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模式。农业国家要想实现经济起飞，就必须全面（包括城市和农村）实行工业化，不仅包括工业技术的现代化，而且包括农业的现代化和农村工业化。这是世界上第一部从历史上和理论上比较系统地探讨和研究落后国家如何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开创性著作，国际经济学界誉之为“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之作。

研究农业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问题，按照张培刚提出的“发展经济学”分类，归于狭义发展经济学范畴。《农业与工业化》主题与当时的“以农立国”论或“乡村建设”学派大不相同。该书还谈及产权、市场、交易费用、国家和意识形态等的制度约束条件。

张培刚认为：“农业的进步必然是工业发展的结果。”工业化“包括农业及工业两方面的机械化和现代化”，就是说，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工业化是国家工业化应有之义。“随着工业化进展到较高阶段，农业生产的绝对数量虽然将继续增加，其经营规模亦将有所扩大，但其农业生产总值在整个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则必然将逐渐降低；同样，其农业劳动者人数，亦可能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渐向城市或其他方面的转移，而在绝对数量上有所减少，在占全国就业总人数的比重上也有所降低。”这些如今天的说法，是 75 年前张培刚在美国调查、研究的结论。书中还提出了衡量“工业化”成功的指标：“只有当工业化进展到相当高的阶段，农业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由原来的 $\frac{2}{3}$ 甚至 $\frac{3}{4}$ 以上，降低到 $\frac{1}{3}$ 甚至 $\frac{1}{4}$ 以下；同时农业劳动者总人数占全国的比重，也由原来的 $\frac{2}{3}$ 甚至 $\frac{3}{4}$ 以上，降低到 $\frac{1}{3}$ 甚至 $\frac{1}{4}$ 以下，这个国家才算实现了工业化”。这就对国家工业化进展有了一个判定的尺度。

如今，我国正经历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过程。张培刚认为：“工业发展乃是农业改革的必要条件”“产业革命以后，工业发展对农业的影响显然大于农业对工业的影响。假若没有制造农用机器的工业来供给必要的工具，农业机械化是无从发生的。”他说：“工业化就一种意思来说，乃是一种‘资本化的’过程”“农业方面的‘资本化的’主要特征，举例来说，就表现在农场操作的机械化和化学肥料的利用上；换言之，农业资本化就是变更生产三要素的组合，提高资本相对于土地和劳动的比例。”这就是我国农村正在进行的农业工业化。

张培刚重回经济学领域后，在一个关键时刻，发表《发展经济学往何处去》论文，批评西方经济学界对发展经济学的悲观情绪。他提出扩大发展经济学研究范围，将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含在其中；改进研究方法，加深分析程度。在他的十几本书和多篇文章中，他自认最值得一提的是《农业与工业化》和这篇文章。

20世纪80年代，张培刚披露了一个从放牛实践中悟出的经济理论。对我国地区经济，他把东部沿海地区比喻成“牛鼻子”，西部是“牛尾巴”，中部是“牛肚子”。中国经济要起飞，只拉“牛鼻子”、扯“牛尾巴”，“牛肚子”还坠在地上是不行的。在沿海开放的同时，实行中部崛起，带动西部开发，方能促成整个国家济腾飞，俗称“牛肚子理论”，成为我国“中部崛起”的理论依据。

改革开放验证张氏发展经济学

读史使人睿智。“发展经济学”是“二战”后新兴经济学的一个分支，1945年10月张培刚博士论文成文时，并无“发展经济学”称谓。20世纪50年代，“发展经济学”才风生水起，刘易斯提出“二元经济”模型理论，舒尔茨提出经济增长源泉的人力资本理论。张培刚提出农业国经济起飞必须全面实行工业化理论，则是在20世纪40年代。

张培刚认为工业化不仅包括传统工业的现代化，还包括农业农村现代化，而且强调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的重要性及其先行地位。直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迈耶关于工业化的观点，才与张培刚40多年前的理论相接近。张培刚从粮食、工业原料、劳动力、市场、资金（含外汇）等方面，提出农业对国民经济的巨大贡献。这个观点比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提出的类似理论要早了16年。

中国是传统农业大国，《农业与工业化》提出的农业国家工业化理论虽说是面向各农业国的，但张培刚说，当时就考虑到农业的中国如何走上工业化道路问题。通常，国人的理论更易在国内施行。可作为农业大国我们当时选择了与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工业化国家苏联的发展模式，绕了近30年的大弯子，才放弃不适合国情的计划经济模式，走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家胡鞍钢多次讲，虽然历史不能假设，如果当时的领导人能够读一读张培刚先生的著作，或者像今天的政治局那样，请张培刚先生讲几课，中国的历史可能就会改写。

时代和实践的需要使理论大放异彩。改革开放以发展经济为中心，国家加速工业化进程。社会需要发展经济学，《农业与工业化》成为人们手中的藏宝图。改革开放40年，张培刚发展经济学如鱼得水。以对农业机械化精彩解析为例，他提出农业对机器采用程度 U ，取决于农产品价格 A 、劳动力价格 L 、机器价格 M 三者关系，即 $U=A \cdot L/M$ 。若 $A \uparrow L \uparrow M \downarrow$ ，则 $U \uparrow$ 。改革使农业富裕劳动力进城打工，农户收入提高 $L \uparrow$ ，国家收购 $A \uparrow$ 。针对农忙劳动力短缺，国家施行农机购置补贴相当 $M \downarrow$ ，三项要素齐备， $U \uparrow$ 农业机械化迅速发展，提振农机制造业，强力助推国家工业化、城镇化，城乡面貌极大改观。其农业机械化理论堪称经典。

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阐发的农业国家工业化理论，对我国实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城镇化特别是农业农村现代化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作者系本所研究员，经济日报高级编辑）

在开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解决好“三农”问题

叶兴庆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指出，“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我国是在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农业经济占相当高的比例、城乡二元结构非常突出的起点上迈上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道路的。开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最为重要、最为艰难的是开创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对拓展发展中国家现代化途径最具借鉴意义的，也是中国解决农业农村问题特别是打赢脱贫攻坚战所创造的经验。

百年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在领导人民开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伟大进程中，在推进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方面取得了重大历史成就、创造了宝贵历史经验。突出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是成功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我们党深深懂得土地对农民、对农业的重要性。1936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告诉美国记者斯诺：谁赢得了农民，谁就会赢得中国，谁解决土地问题，谁就会赢得农民。在不同历史时期，我们党紧紧抓住土地这条主线，调动农民支持革命、参加建设、投身改革的积极性。过去，我们靠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提高了土地占有的公平性和农业发展的包容性，使农民大致均等地占有土地这一最重要的农业生产资料，调动了农民发展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在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新框架下，我们将进一步落实集体所有权、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充分维护农民集体对承包地发包、调整、监督、收回等各项权能，充分维护承包户使用、流转、抵押、退出承包地等各项权能，加强对土地经营权的保护、引导土地经营权流向种田能手和新型经营主体，克服一些国家存在的农村土地市场失灵、小农户现代化转型进展艰难等问题，逐步提高我国农业规模经营水平和农业竞争力。

二是成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我们党深深懂得端牢饭碗对人口大国的极端重要性。1949年7月，时任美国国务卿艾奇逊预言，“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1994年9月，美国学者莱斯特·布朗发出“谁来养活中国”之问。面对种种质疑，我们党领导广大农民进行艰苦努力，从人民公社时期大兴农田水利到改革开放后“一靠

政策、二靠科学”，再到新时代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实现历史性飞跃。2008年以来，我国连续14年人均粮食占有量超过400公斤的国际公认安全线，2015年以来我国连续7年粮食总产量超过13000亿斤。我们将继续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统筹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一方面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提高农机装备水平，保障种粮农民合理收益，确保国内农业综合生产能力逐步提高；另一方面优化农产品贸易布局，实施农产品进口多元化战略，支持企业融入全球农产品供应链，提高进口的多元化、稳定性、可靠度。

三是成功打赢脱贫攻坚战。由于历史、区位、资源禀赋、人力资本等多方面原因，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群未能抓住农村改革、工业化城镇化带来的两次摆脱贫困的重大机遇，我们党先后组织实施了“三西”地区和老少边地区专项开发、《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和《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党的十八大以后，为补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短板，我们党创造性实施精准扶贫方略，确立“两不愁三保障”工作目标，实行“军令状”式责任制，动员全党全国全社会力量，组织实施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力度最强的脱贫攻坚战，形成伟大脱贫攻坚精神。全国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9989万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我们将继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接续推进脱贫地区乡村振兴，加强对农村低收入人口的常态化帮扶，扎实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在开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进程中，我们党在如何解决好“三农”问题方面也经历过曲折。比如，在工农城乡关系上，一度对农业农村攫取过多，农民负担过重，尽管党的十六大以后出现转折性变化，开始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但直到今天城乡差距依然过大，城乡二元结构仍是我国最大的结构性矛盾。再如，在农民进城问题上，一度被视作“盲流”遭到严格管控，尽管2006年以后转向保护农民工权益、促进进城农民的市民化，但中国式的农民工问题存续时间过长，既不利于提高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质量，也不利于农村土地流转集中和现代农业发展。

《决议》指出，“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也永无止境”。认真贯彻《决议》精神，必须坚持理论创新，坚持开拓创新，对过去现代化进程中没有解决好的“三农”问题继续探索解决之道，对未来现代化新征程上可能出现的新“三农”问题扎实开展前瞻性研究，为拓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丰富内涵、走稳走好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贡献力量。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2021年12月20日）

报：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工作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
送：有关部委司局、全国各省农委（农业农村厅）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及各研究所
发：农业经济技术研究所各处、室、中心及下设机构

总 顾 问：刘 坚 郭书田

副 主 编：辛 梅

邮 箱：zgynjs@163.com moagov@163.com

网 址：www.zhongguanyuan.com.cn

www.moagov.cn

地 址：农业农村部北办公区 16 号楼、18 号楼



主 编：胡兆荣

编 辑：孙正恩

邮 编：100125 100810

电 话：010—59195293 66117652

010—66067899 66167899

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南 3 楼、4 楼

